

# 应用 传播学

苑子熙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应用传播学

苑子熙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应 用 传 播 学**

苑子熙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ISBN 7-81004-219-X/G·75**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45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册 定价：2.90元

## 序：创建结合中国实际的传播学

中国正在改革开放中前进。中国正在冲破长期的闭关自守走向世界。中国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这就需要传播交流。但是当今世界的传播事业，比如新闻传播媒介，还仍然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垄断和控制。多年来，第三世界一直在呼吁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特别寄希望于中国。因此，无论是为了中华的振兴，或是为了对人类现代文明做出贡献，都要求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传播事业。我们需要引进作为传播事业“硬件”的先进的电子技术，也需要建树作为传播事业“软件”的新兴学科——传播学。

人类文明从来是在传播交流中发展的。因此对传播的研究，也是古已有之。我们的祖先不但对传播的“硬件”如造纸、印刷术等，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而且对传播的“软件”——传播的规律和效果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过许多探索和经验总结。毛泽东写的《反对党八股》等论文，也可以被认为是传播效果研究的杰作。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中国胜利，当然首先因为它是真理，同时也不能不归功于传播者使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符合客观规律的传播实践。遗憾的是从实践概括到理论，我们做得太少了。比如，我们还没有一本可以称得上科学著作的宣传学，特别是取得

政权之后，我们同志习惯于高高在上，认为宣传就是“灌输”，就是“我打你通”，就可以“飞机上吹喇叭”，就可以“大哄大嗡”、“大造声势”，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宣传目的，而事实证明，其效果往往是相反的。在西方传播学刚兴起的时候，也曾出现过“传播子弹理论”，把受传播的受众仅仅看做是接受子弹的“的”（靶子），而忽视对受众的研究。直到20世纪40—50年代“有限效果理论”的出现，才否定了“传播子弹理论”，之后又有“多级传播说”等的发展。这说明西方传播学也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发展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传播学，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它又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种成果，是现代电子技术和新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后的产物。对于资本主义，我们应该批判；对于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我们又要认真研究，创建结合中国实际的传播学。

苑子熙同志是我国对传播学研究较早的学者之一。他在教学的同时，对传播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力求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如传播学与宣传教育学的关系等。希望《应用传播学》这本书的出版和传播，对我国的传播事业，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能起到它应有的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  
闻出版署特邀顾问

苑子熙

1988.2.29

## 序：人人都该重视的一门学问

一提传播学，在我国很多人可能还感到比较陌生，认为与自己无关。其实并非如此。

诚然，传播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在我国时间还很短，研究的人也还很少。这门学问需要一些专家、更多的专家来研究。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门学问又是与每一个人都有关联的。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又都是接受传播者。只要你开口讲话给别人听，写字（包括写信、写文章、写书等等）给别人看，你就是传播者。聋哑人不会说话，打手势也是在传播。至于新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以至商业工作者，等等，统统都是传播工作者，就更不用说了。问题在于，在这些工作当中，特别是说话（包括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发言、以及个别交谈），写一点简短的文字，有没有什么学问可言，有没有什么必须遵循的原则，有没有传播学的问题可研究。我认为有，而且有关系极为重大的学问，应当引起人人的重视。

苑子熙同志的专著《应用传播学》，对上述问题都作了很好的回答。在他的著作中，对于传播学和与此有关的很多

的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进行了系统周密的论述，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一方面，这对于建立我国社会主义的传播学作出了贡献，对于传播学研究工作，对于专业的传播工作者，都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大家同意上面说的人人都是传播者，那么，传播学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值得研究的。

这里请允许我举一些很浅显的例子。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and 政府的法律法令作了不正确的传播，就可能给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或者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如果对工作情况、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了不正确的反映，就可能使领导机关的决策不符合客观实际。如果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就可能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造成损失。如果对于开放的政策作了歪曲的宣传，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情况作了不正确、不全面的介绍，就可能在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青年中造成错觉，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天堂。如果对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作了不正确的解释，就会使一些幼稚的青年上当受骗，打着争民主、争自由的旗号去干危害民主和自由的蠢事。如果对物价政策作了不正确的传播，以讹传讹，就可能引起人心浮动，甚至市场混乱。至于故意制造假信息去造谣惑众，那后果就更加不堪设想了。上述这些不正确的传播，在各种传播渠道中，包括小范围的谈话、给个别人写信，都可能产生。这还不值得我们人人引起高度注意吗！古人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固然有一定的夸张，而且一般指国君。我们普通人，特别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和掌握一定传播工具的人，一句话说得对不对，有时确实可以起到很大的好的或坏的作用。

这就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传播者（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包括传播小道消息），都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时时想到自己传播的东西将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不负责的乱说一通，对他人、对社会不负责任，说严重一点也是一种罪恶。退一步说，即使传播的内容没有错误，象那些粗制滥造的电视剧和其他文艺节目的传播，浪费千千万万人的多少宝贵时间，这是难以计算的。要算也必将是十分惊人的。如果内容不健康，那就更加误人匪浅了。

此外，接受传播者，也应有冷静的分析，不能听风就是雨，轻信那些无稽之谈，甚至继续去传播。

以上，当然主要是指一些重大的政治、政策和社会问题。至于学术、文艺问题的一些自由讨论，以及其他一些与中央已经确定的方针政策并无抵触的议论、意见，那就不在此例了。

为了传播的正确，上面讲了高度的责任感，实际也涉及职业道德或社会道德的问题，这是需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的。但是，只是这些还不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为基础。否则，分不清是非，自以为是对的，实际上却是错的。只有好的动机，还是收不到好的效果。总之，是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的问题。而所谓全民族，当然包括你、我、他，包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列在全民族之外。从中华民族居于各民族之林来说，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历史上中国的文明影响过世界，世界各国的文明也推动过中国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对传播学的研究和传播实践的发展，中华民族

素质的提高，也将为各民族、为整个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说了这些，多是老生常谈，而且苑子熙同志的著作中大都谈到了。所以在这里重复，一是觉得这些问题在当前并未完全解决，二是感到有些人在口头上懂，行动上并未这样做，说明实际上还是不懂，或者说不是真懂。

最后还应当说一句，苑子熙同志的著作，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他自己也曾说过：“这只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起步。”预祝他为创立结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杜 敬

1987年1月8日

## 代前言：我国传播学研究情况<sup>①</sup>

### 一、我对传播学的理解

传播学在我国从开始介绍到研究、教学，已有七八年的时间了。但是，研究者是少数人。关心的人很多，大多数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和青年的宣传教育工作者，包括新闻广播电视电视工作者。传播学 and 我们的新闻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关系很大，但是这些部门中研究的人并不多，在认识上也并不完全一致。这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下面谈我的认识。

传播是信息交流，一切有信息交流的地方就有传播活动存在。比如，今天我们开这个新闻学会的年会，作学术交流，共享一年来（这次我们是几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就是一种传播。有一个定义性的说法叫做：“传播是信息的共享”，即新闻、资料、知识的共享。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可以成立的。是叫“传播”，还是叫“传”，在我们的同志中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双音词“传播”说起来和听起来顺口顺耳一点，于是，多数人就约定俗成叫传播了。其实叫“传学”比叫“传播学”更确切些。“传”这个概念，在我们中国2000多年前就有了。《论语》一书中有一句，曾子曰：“吾

---

① 1986年2月9日在首都新闻学会年会上的发言要点。

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个“传不习乎”的“传”和现代“传学”的“传”含义是一样的，既含传授的意思，也含知识和信息交流的意思。

传播是人类的社会本能。它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活力。社会没有传播，人与人之间不交往，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人类传播起源于人们的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又反转来促进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传播使人聪慧，闭目塞听使人愚昧，这是一种法则，一种真理。传播事业发达的社会，也标志着其文明昌盛的程度。历史与现在，中国与外国，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传播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很大，个人之间、组织之间、国家之间，历史与现在，甚至各种学科领域中的有关“传”的学问，都应包括在内。研究工作的任务应该是寻找和认识它的规律性。

大众传播这个概念的外延就小多了。它只包括面向不知名的广大劳动群众的传播，例如，广播、电视、电影、报刊、通俗印刷品等等。为什么要指通俗印刷品呢？因为广大劳动群众听不懂看不懂的传播就不叫“大众传播”了。

传播学与广义的宣传学是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回事。为什么？第一，如果说传播是知识共享，那么宣传的目的，例如“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这何尝不是知识的共享呢？第二，如果说传播的“传”是双向的，是个有往有来、有传播有反馈的过程，那么，把宣传的传及其效果、反响、回报联系起来去认识和研究，不也是双向的和往复的

过程吗？第三，如果说传播的“传”有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和社会协调的作用，那么宣传的“传”则更具有“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二者之间是相通的。在建树宣传学的时候，不妨借鉴传播学的某些有科学性的原理，反之也一样。就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原理而言是一致的，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的差异在于：（一）其内涵与外延的大小有不同，（二）其动机目的不甚相同。宣传的主观意向大于传播。判断宣传与传播两种概念时，不难发现有传播价值的信息不一定有宣传的价值。宣传的内涵与外延比较而言是小于传播的，因此有人认为宣传学应是传播学的分支，这是有其道理的。

传播学与广义宣传学二者都是有阶级性的。不同阶级的传播学或广义宣传学，其研究者、著作者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因此，其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立场也是各不相同的。从方法上说，可以彼此借鉴，从传播实践的目的来说，在一般情况下是彼此各异的。

## 二、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起因

研究的起因有两个：一个是西方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的现实；另一个是我国新闻教育界发现西方传播学中，有对我们新闻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有用的东西。

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孕育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宣传的影响所致。兴起时期是4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冷战时期的产物。在西方，主要是美国从宣传战中寻找宣传的规律性，以适应军事宣传（包括

冷战宣传)、政治宣传(特别是总统竞选宣传)、经济宣传(特别是商品推销宣传)的需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类的传播渗透在很多学科之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例如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社会学、精神病学、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等,都要涉及到对人的传播活动的研究。因此,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各自从本学科的需要研究传播行为和传播行为的影响。传播学在西方的研究是在军界、政界、垄断财团和他们的大企业或基金会支持下进行的。不仅出钱支持,甚至研究的课题也是由他们制订的。这种研究的基础,主要是美国社会的实际,即他们的军事、政治、思想、经济的实际。这可以从他们的传播学著作中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研究者,特别是几个“传播学鼻祖”,都是在美国军界任职的人员或咨询人员,施拉姆<sup>①</sup>也在其内。

传播学由美国传到北美、西欧、日本和第三世界,苏联和东欧各国也在研究,并且有了分析评介性的著作。

世界各地都在研究传播学,这就无形中给我们提出了研究的任务,何况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从古至今,传播经验之丰富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更是大有研究的必要。

起因之二,是我国新闻教育工作者在阅读了西方传播学著作后,发现其中有些原理和研究方法是可以借鉴的,就开

---

<sup>①</sup> 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也译宣伟伯)1917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马里塔,1932年在依阿华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授、传播学研究所主任、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他曾任美国新闻总署、美国之音、国务院、国防部等机构的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过战争宣传的设计工作。1982年5月曾来我国访问。

始了有选择的翻译介绍工作。

### 三、传播学研究的开端与现状

#### (一) 1978——1982年

美国传播学传入我国始于1978年下半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7月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上刊载了郑北渭翻译的《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国际新闻界》第1期刊载了张隆栋摘译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1980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开设了介绍性的选修课，1981年该系主编的《新闻大学》季刊刊载了陈颜昭的传播学讲座第1讲。北京广播学院77级大学生郑固固撰写了《试论新闻工具中的纵向信息传递和畸变》（见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论集》第3集上发表了郑兴东、陈仁凤合写的《传播方式的探讨》、同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完成了硕士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11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同读者见面。这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交流委员会”关于世界传播秩序的报告，它给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世界范围的权威性资料。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一些新闻院校、研究部门，关于这方面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就陆续地开始了。发表的译文、文章也逐渐增加。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国际新闻界》季刊第2、3、4期连续刊载了张隆栋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

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双月刊《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第2、3期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国际新闻界》第2、3期，分别刊登了由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查苏尔斯基主编的《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一书的主要章节，评述了美、英、日、法、西德、意大利等国的大众传播学，基本上反映了苏联新闻学术界对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情况。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介绍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译作论文集《传播学简介》一书。

这些情况为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第一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创造了前提。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传播学座谈会，来自首都、上海、广州、厦门和全国新闻、教育、研究单位的30多名代表，讨论如何评价和对待西方传播学问题。会议分析了西方传播学中可借鉴之处和它的糟粕所在，认为对待西方传播学的态度应概括为16个字：“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第二次传播学座谈会于1986年8月21——24日在安徽省黄山区举行，情况见本书184页附录四）。

## （二）1983——1985年

北京第一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后，我国对传播学的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开展。这由以下事实证明：

1. 中国社会科学新闻界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同志去美国考察，专门考察了美国学者中对传播学“传统派”理论的不同看法。

2. 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中，有的同志开始对西方传播学写分析研究性文章。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珊的《从美国新闻业看信息社会》、《美国阻挡不了传播新秩

序的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力丹的《对〈传播学概论〉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四种报刊理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偏见》等。

3. 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些大学开了这方面的选修课或讲座课。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生和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暨南大学新闻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新闻传播专业、1985年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国际新闻专业等。

4. 1983、1984届毕业的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撰写传播学论文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生刘国胜，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周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范东升、王志兴等。

5. 1983~1985年中又出版了一些西方传播学和有关的书，包括《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宣传战史》、《舆论学》，还有《各国新闻出版法》、《各国广播电视法》等书。其中有的虽以报刊理论命名，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但是它对西方传播学的影响很大。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双月刊《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继续不断地发表研究探讨性文章。

6. 1985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播座谈会；8月上海外国语学院召开了传播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 （三）上海传播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情况

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学院召开。主要组织者是英语系主任戴炜栋及国际新闻专业主任钱维藩教授。还有两位国外召集人，一名是美国佩帕达恩大学传播系教授凯思米尔（Fred

L. Casmir),另一位是澳大利亚堪培拉高等教育学院传播学教授奥斯本(Citraeme Osbrne)。与会代表国内30多名,国外有13名一分别来自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会上宣读论文30篇。其中国内代表有17篇,国外代表13篇。原定6个讨论题,但是30篇论文的内容,不仅大大超过6个题目的范围,而且涉及到多种学科,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数学、公共关系学、国际传播学、电视学、系统论、信息论、儿童教育学等多种角度论述了传播问题。

这次会议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论文中的三种思想倾向:第一种,我国代表提供的论文,是从中国的历史学、新闻学、报刊学、教育学等方面论证传播原理的。第二种,是以澳大利亚代表奥斯本为代表的观点,强调特定环境的重要性,就是强调不要生搬北美的传播学体系,强调和本国的传统及利益相结合。并且分别分析了日本、西欧、南斯拉夫、澳大利亚等国的传播学特点,是典型的第三世界的观点。第三种,是以美国代表凯思米尔为代表的观点。他主张“相互作用和情景次文化”,意思是主张寻找国家间彼此都能接受的文化交流的道路。他不赞成传播帝国主义,并且支持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但是,他的论文中自信地宣扬了个人自由主义的哲学。

这三种思想倾向,前一二种我认为好的。第三种倾向既有积极的因素值得赞赏,也有值得分析与争辩的问题。为此我写了《人民愿望个人自由和大众传媒》一文,即本书的第12章。这个会上的5篇论文被选入《传播学文选》一书。其中一篇名为《基于中国模式的传播学理论》是澳大利亚米